

人道与佛缘

戴厚英◎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 文 寻 真 录 丛 书

相比之下，我更
傾心于佛教，它
的教理與我的文
化選擇更為吻合
我欣賞它的“羅
生平等”和“命
自我立”。真正
是不靠神仙皇帝
可以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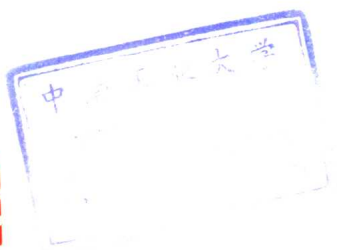


0866110

人道与佛缘

戴厚英◎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44.628
DHY

责任编辑 李 卫
封面装帧 陈 楠

·人文寻真录·

人道与佛缘

戴厚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192,000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8-02835-4/G·472

定 价 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 56628900×13

孩子的眼睛看妈妈

戴 醒

李向平先生编这本《人道与佛缘》时，来信约我写一点有关妈妈人道主义和佛教思想的文字。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行。主要倒不是李老师顾虑的“忙”——虽然确实是忙。两个幼小的孩子，繁重的家务，竞争强压力大的科研，几乎占去了我生命中除睡眠以外的所有时间。但是这一年多来，凡是与妈妈有关的任何事，我未曾有过一分一毫的懈怠，而所有的这些事情似乎都构成了通向妈妈的特殊阶梯，让我在清醒地认识到她已不在人世的同时，又能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她真实和亲切的存在。

主要是因为不知如何写。用“人道与佛缘”几个字来总结妈妈最后二十年的人生哲学，应该是很恰当的。可是这二十年中，我先是童稚的少女，接着是自然科学大潮流的盲目追随者，近几年则儿女情长，一心一意地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对于妈妈的精神世界，我知之甚少，似懂非懂，直到妈妈去世，我由于内心所受的极度震撼，也由于对妈妈怀有一份深深的愧疚，才真正开始去了解 and 认识她的一切。但我看

妈妈，一如坐井观天，看到的是那么小那么有限的一部分，而这小小的一部分，已经让我花了好大的心思去咀嚼消化了。

但我还是答应了李老师，一是因李老师的恳切，我却之有愧，二是我也确实有几句话想说出来，且不管它成不成文章，与本书的主题相不相关了。

我观察下来，这个世界上的人，大约有两种活法，一种人用身体活，另一种人则用心灵活。用身体活的人大都过得安逸，日行劳作，应付三餐，喜怒哀乐均围绕着衣食住行展开。除此而外，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再去困扰他们，目标现实明确，烦恼也具体简单。用心活的人，就要痛苦得多，这些人多是理想主义者，而现实常与理想背道而驰，因而日常生活中的大小问题，都会引起一连串对生命及存在终极意义的思考，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希望和失望、大喜悦和大痛苦，世事沧桑，人生苦短，因而常常的，痛苦大于喜乐。

我妈妈戴厚英，无疑属于后一种人。

妈妈的一生，偶然中处处是必然。如果不是她的好强和聪颖，她的生活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或许现在，她还在安徽某一个小城或小镇上，安安稳稳、平平淡淡地活着。可她就是那么聪明好学、倔强独立，勇于追求，她十几岁就离开温暖的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从此开始了波浪起伏的一生。

读妈妈年轻时的日记，我真真地感受到一颗活

蹦乱跳的心。她的真诚，既带有那个时代打在所有年轻人身上的烙印，又有她独特的、奉献全身心的热烈。这样的真诚执着，在任何别的社会或时代，都可以被转化成极大的创造力，但在“文革”时期，它却由于被纳入了一种“主义”的轨道，而变得盲目甚至具有破坏性。妈妈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我没有切身的体验，却在懂事后从周遭所给她设置的重重障碍中，有了一点间接的认识。我可以想象到她将所谓组织的命令当作革命的需要，又更进一步幻化成对理想的追求，而去做她原本不想做也不会做的事。她那颗善良真诚的心因而时常惶惑，而这种惶惑越到她日记的后期越明显。直到终于有一天，她意识到理想和革命不过是别人手上挥来挥去并换来换去的旗帜时，才如梦初醒。而此时的她，在这旗帜的挥舞下，已经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她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美好的特质。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是在这种迷茫和失落下的被迫反应，也是她的善良真诚的自然反射，她太真挚，太相信，太用心了。

妈妈为宣扬人道主义吃了很多苦，曾经三番五次地挨批，曾经被赶下讲台。然而，人道主义似乎并没有给她提供一个完整的人生答案，相反地，对人性、人情和人权的肯定反而将她从问题的表层推向中心，给她带来了更多更大的迷失和痛苦。

也许就在此时，她找到了佛。

记得她那一阵子的来信中，主要谈的就是她怎

么读书，又怎么从读书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和收益，她曾经非常地迷恋庄子，有时信中竟大段大段地抄录，她还劝我也读一些这样的书。但这对当时的我，实在是一点吸引力也没有的。我当时读的，多是科研书和如何教养小孩的书，关心的是怎样尽快地拿到博士学位，找个好工作，但是妈妈能在书中找到宁静，却给我的内心带来很大的安慰。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接到她一封来信，说她信佛了，成了佛教徒。听她叙述她在寺庙里听宝刹钟声的感动时，我的心也被深深打动了。我那时还没读过老庄，也念不懂佛经，我所知道的那点皮毛大都是道听途说，或是胡看瞎翻来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竟能感受到妈妈所感到的那份欣喜，她在中国古代的文化精华中找到了开阔精神世界的钥匙，在庄严的佛殿里，找到了回家的路。

那时的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自从懂事起，我的心就常常为她揪着，她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可是她活得那么苦，那么累，看着她在求索真理时的痛苦和挣扎，我心如刀割，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她能够快乐，安宁。

这一年多来，常有人对我说妈妈活得苦，死得冤。我听了，淡然一笑。同样一件事，每个人看到他自己想看到的東西。今天的我，在经历这样一场人生劫难之后，看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一个我心里明了却说不明白的层面。妈妈经历的所有这一切，都只

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目的,就是要领她回家。现在,她已经到家了。或许她还没走进属于她的那间屋子,但是她已经进了家门。那个家,那个灵性的、理想的、光明的家,不是谁都可以看见,可以进去的。

有关她临终情景的报道,我一直没有勇气看。但一位挚友告诉我,她对凶手说了一句话:你会后悔的。说得很平静,她没有叫救命。这就是她。我无法忘记那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我流着泪向有神却无形的她喊着:你为什么不呼救?但是我能理解她在生死关头的选择和决定。她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当她对人生及其归宿都看得很清楚的时候,生和死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她只是需要换一种形式思考,换一个地方修炼。

作为女儿,我当然希望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过的是一生平凡却富足的生活,老来跟我和儿孙们共享天年,但是我无法选择。每一个人到世上,都有一个目的。妈妈短短的一生,划下了很深很深的足迹,震撼和温暖了许多许多人的心。她无私无畏地生,从从容容地死。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母亲而骄傲。

1998.4.23 日改定

叩问人间

李向平

戴厚英，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她初登文坛时，一部长篇小说《人啊，人！》，引出中国知识界一场风雨；她遇害逝世时，文坛痛失戴厚英，尽有一番哀恸之情。但在其身后是非仍众说不一。

“文革”中的人道主义批判者；几十年之后人道主义的提倡人；最后皈依了佛门。

一部纪念文集，集中了文坛上对她最为主要的议论与评价。书名取得别致：《戴厚英啊，戴厚英！》，与戴厚英的成名作《人啊，人！》异曲同工，大有感慨、聊表呜呼哀哉之意。

三十四年前，在一次文艺思想大批判的运动之中，以其能言善辩，狠狠批判人道主义的戴厚英，被誉为“文艺思想战线的新生力量”——“小钢炮”。可是，三十四年后，这门“小钢炮”却双膝跪倒在浙江奉化雪窦寺大雄宝殿的蒲团之上，面对释迦牟尼大佛像，顶礼膜拜而最后皈依，成为一名佛家信徒。她的一位生前挚友如此写道：“这是历史对她的嘲弄？还

是她在嘲弄历史？是人生的悲剧？还是人生的喜剧？没人能够回答，也无须回答……”

寻觅这一答案，绝非简易之事。尤其不要轻易地猝下结论，以求盖棺论定。

对于十年“文革”中她的是是非非，戴厚英已在她的自传体著作《性格·命运·我的故事》（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中作有无情而严厉的自我批判。她反反复复地询问自己：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我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她的态度应当是诚恳而严肃的。“写着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仿佛看着海面上漂浮着的一团泡沫，随着海水的浪头忽上忽下地起伏，一会儿清洁，一会儿浑浊；一会儿竖起一根草棒，好像小船竖起了风帆，一会儿又一明一灭，被自己撕成了碎片。原来以为已经清楚的自我形象，倒反而模糊起来。”

这是一种自我忏悔。借助着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中所说的“政治媚俗”一语，戴厚英意识到：她既不是英雄，也不能算懦夫，而是一位“政治媚俗者”。一会儿上台，一会儿下台；一会儿斗别人，一会儿被别人斗。无论在什么处境之下，都不过是要向他人表明，自己依然是革命洪流中的一朵浪花。

这是处在黑暗中的灵魂的呻吟。戴厚英在这俗世政治的大循环中试图努力脱出。然而，她的“反省”好像走进了死胡同。她无可奈何。因为个人的

生存状态的完善与生存环境的完善没法同步进行。大概也就是在这种心境之下，戴厚英曾对我说过：她的自传下半部分将难以为继。

我想，自1980年时她写作并出版《人啊，人！》以来，戴厚英或许就是处在这种痛苦的反省与反省的痛苦里，甚至是无法自拔。她在《人啊，人！》“后记”里曾有真实的心境披露：“随着揭发‘四人帮’斗争的深入，我知道了许多原来不知道也不能想象的事情。猛然间，我感到心中的神圣在摇晃，精神上的支柱在倒塌。我什么也看不清了。我常常一个人发呆发愣，痛哭，叫喊。我多么想抓住我曾经信奉的神祇和那些努力在我心里塑起神像的人们来问一问：以往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为什么在当时你们是另一种说法？是有意隐瞒，还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抓得住吗？那些曾经信奉的神祇？自然抓不住！一切的一切仿佛过眼烟云，如幻如影。但它们似乎又那么真实地发生过史无前例的作用。

戴厚英站在精神与信仰的废墟上。何去何从？这时她时适不惑之年，可又正值她生命大惑的岁月。事业——失败；生活——失败。

许多人由迷信走到了不信，由狂热走到了虚无。更有一些无特操、无持守者，本没有什么信与不信，可以把媚俗当作信条，继续献媚，从而成为了灵魂自媚式的肯定。

处于如此痛苦、迷惘的精神状态,戴厚英倔强的性格发生了作用。为什么不能为自己再活一次,按自己的理想重塑一个自我?过去半辈子,丢失了自己;今后半辈子,应当找回自己。否则,应当立即死去。

在精神与信仰的废墟上,由此凸现了一个自我,一个“人”字渐渐地竖立了起来。虽然“历史和现实共有着一个肚皮,谁也别想把它们分开”,但是,无论如何,一支以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作为主旋律,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历史与现实的束缚。灵魂被扭曲时的痛苦和呻吟,黑暗中爆出的心灵的火花,人生的血迹与泪痕,以及无限欣喜的、令人鼓舞的人性的呐喊与复苏。这就是《人啊,人!》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应有的地位,也是《人啊!人》在当代思想史上应有的意义。

对于戴厚英来说,她的命运由此有了转变。她成为一名作家,一名知名作家,一名一出世就被视为异端的作家。一部《人啊,人!》为她的下半生拉开了序幕。用一句枯燥乏味的句子来表达,那就是,一门批判人道主义,批判“文学是人学”的“小钢炮”,从此成为控诉“文革”对于人性、人道的摧残和压抑、大声疾呼人道主义的充满激情的张扬者和信奉者。

这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是她人生的痛苦经验的结果。然而,事实表明,在从反人道主义向人道主义的转变之中,戴厚英却并没有真正找到

她的生命家园。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戴厚英又从一个人道主义的信奉者，转而成为一位佛门的皈依人。前一转变，人们似乎易于理解。不论如何视之为异端，总归能够肯定。后一转变，引起的更多的则是不解、困惑。人道主义怎么能与佛教有缘？

1995年4月，戴厚英在浙江奉化雪窦寺结识月照法师之后，写作有《结缘雪窦寺》一文，刊发在广东《随笔》杂志1995年第4期上。那时候，她自己的内心感受已与他人的态度构成明显的反差。

“我梦见自己走在一条河边，河很宽，岸也很宽。河水静，我也很静。多少年过去，梦境依然鲜活，因为我一直没明白那是一条什么河，何以无人迹声音，又无水纹波涛？现在，我却突然找到了解梦的钥匙，那不就是我和我的影子吗？那河是我的自性，那岸上走着的就是离开了自性的影子。我何不将影子抛进河里，化为河水，与河融为一体？那样，河也不见，我也不见，岸也不见了。便不需要再寻找什么，不要船，不要桥，不要救生衣。我在河里，河在我里，宁静浩渺，川流不息，岂不是大自在了？想到这，泪如泉涌，心大欢喜，一连声地念‘南无阿弥陀佛’，数十声，数百声，无暇去计。”

这是她与佛结缘之后的宁静心境，与她多年前反复做的梦境相通，是寻觅人生大自在的独特体验。可是，一位与她久未联系的老友便有书信邮来责备：“一个关心人民的作家”去念阿弥陀佛了，真是奇迹！

这也使我想起余秋雨先生曾在其《文化苦旅》的一篇文章中谈及李叔同时，深以为李叔同的出家为僧，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尴尬。那么，戴厚英之学佛与信佛，亦是人道主义的一大尴尬？

“文革”之后直到时下，许许多多的人已知那曾有的信念，都非真实。干脆一了百了，什么都以不信处之。用虚无来填补精神、心灵上的空白。可是，这种虚无主义最终遗留下来的依然是对于困惑、迷惘的无奈与执著。

戴厚英不属于此类。一方面，她觉得她生活过、思索过，就应该收获。不论收上来的是野草、是蒺藜，总是我们的创造，心血的创造。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停止向生活索取。另一方面，她虽然从迷信中蹒跚走出，心中的神圣在摇晃，精神上的支柱在倒塌，但是，她始终不是心甘情愿。她甚至想抓住那些曾经作为精神支柱的神圣来追问，究竟什么才是真实？

在不相信之中，她依然在追寻着可能的相信。她主张人性的张扬，人道的尊崇，她要求生命、个性价值在社会现实中最大可能的正常体现。但是，依据我的理解，这应当只是她追求可能的相信的一段路径而已，绝非精神的终极。生命、个性、人性、人道，总该有一个最后的出处或是依托。否则，将与在沙上聚塔相似，一触即溃，或有如竹篮提水终究为空。

当然，这一最后的出处或依托，见仁见智，东西异说，即使在中国以儒释道为主干的精神文化中也
不乏众说纷纭，异彩纷呈。

在戴厚英的人生体验、生活阅历之中，她是与佛有缘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家庭生活环境的影响，她曾经与佛建立有一种“松散的却又会心的”联系。她自己也将这种与佛陀之间若明若暗、若断若续的关系，称之为“佛缘”。十余年前她所写下一篇文字题为《佛缘》，记录的就是这种心境。

虽然她心中还有“敬鬼神而远之”的“儒缘”，还有无神论的灌输式教育，但是在她的心底始终有一佛陀的影子在浮现。记不清从哪一年开始，她反反复复地在作着一个同样的梦。

她梦见自己孤零零地置身在一群奇特的山峰中。山峰与山峰相隔不远，却又互不相连，好像是平地上搭起的几座积木。有一群主峰，在群峰的包围之中。朦朦胧胧，她感到那是一尊佛像。佛像的肚子里又有一座佛殿。她怀着虔诚而热切的期望，不顾一切地奔向那座主峰，似乎是专程来朝圣的香客。可是一旦接近它，她就心情慌乱，无限惊恐，躲之不及。好像，等待她的，将是一场对异教徒的审判。梦，常常在这时醒来……

若即若离，可敬可畏。似可依托却又不可捉摸。无论何时何地，心中总是感到不踏实、不自在。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苦恼？——在兼济天下与独

善其身之际，在庙堂意识与江湖逍遥之间，在出仕与出世的紧张关系之中。

这样的困惑纵有三头六臂、上天入地、一跟斗三万六千里的功夫，也很难折腾出去。很自然，戴厚英也只能如此！一声“人啊，人！”的人道呼唤，风风雨雨，笔底波澜，她寻觅了十余年。但是，人道主义解决不了她面临的现实问题与精神难题。一个有血有肉、率直真诚、横是眼睛竖是鼻子的生命个体，究竟要把立足的脚根置于何处，方才永远避免内心忏悔的痛苦与自责，从自我认识、精神持守的层面将“政治媚俗”的任何可能性予以斥除？

从迷信到不信，从不信到想要相信。她必须面对这些问题，不断地叩问自己。

在这些不间断地叩问之中，她在自觉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她去过教堂礼拜，读过《圣经》，也听过牧师布道；她同样也读过《古兰经》。但是，她的精神依然处在极大的不安之中。上帝或真主那里，没法找到她所需要的精神住所。以她的个性和学识，她不是一个找寻某一宗教，把身心简单托付了事的人。宗教中的神祇圣灵，也不能满足她充满理性与激情的人间关怀。她找寻与思考的，绝非一般善男信女的宗教寄托。

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戴厚英的内心世界变化较大。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写道：‘她想回到乡下去，做一个隐士。’她还在另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

“我要考虑认真安排我的后半生了。也许我将放弃一切追求，做一个隐居者。”

这里反映的是她的精神与现实的一种特殊关系，很难予以简单的价值判定。倘若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自隐，又何尝不可呢？一个作家，一个学人，自持心灵的洁净，然后才可能具有净化社会现实的作品产生。

她没有成为基督的信徒。她还是与佛教有缘。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一的佛教，与戴厚英有着一种由历史、乡土、家族、生活环境所造成的亲和力，一种近乎天然的缘份。

这种缘份，戴厚英自己也未能清晰地认识。但她的感受很是强烈。比如她去过杭州灵隐寺。多少年时间过去了，大雄宝殿的大佛，给她的印象始终难忘。作为一种强烈的体验，她以为那是一种崇拜混杂着恐惧的震惊。与此同时，她又感到一种宁静，一种亲切。有时甚至觉得，能够相信神佛，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可以忘却和摆脱人世间的纠纷和烦恼。

于是，她在后来几年中，与佛教之缘份更是亲近。从《戴厚英啊，戴厚英！》这本纪念文集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

“一向入世甚深，以干预生活为己任的女作家，忽然成为了一位手持念珠、口诵佛号的佛教徒，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她每天念佛颂经，坚持两小时坐禅。有一天她